

王宪文和高兴文等一些老同志回忆电网工人的悲惨遭遇时，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不是共产党把我们从水深火热的地狱里拯救出来，我们就是逃出电网也活不到今天，我们决不能让军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重演！”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黑龙江省鸡西市政协文史办供稿）

对修筑军事工程 劳工的虐待与残杀

修筑海拉尔北山要塞劳工的悲惨生活

张玉善口述 隋福祥整理

伪满康德二年（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家乡河北滦县北小寨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致使生活无法维持。无奈，我被迫离开家乡，来到郑家屯。当年2月的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一伙招工的人，他们声称：“去东山里开荒，每天工钱壹元伍，吃三顿馒头。”我信以为真，就报名应招，没想到却掉进虎口。

我们这些应“招”的人，被集中在郑家屯一个大四合院的旅馆里，一共有400多人。第二天，我们这些人就被装进五六十个大闷罐车厢里，车门上锁，只留一个窄缝，车开后，有一个去过东山里对当地地形比较熟悉的人对我们说，“这不是去东山

里，这是往北开，到满洲里下煤窑。”我们大家这才知道受骗了，但也没办法，因为想跑也跑不掉了。

火车开了三四天后，一个夜晚，日本兵把车门打开，叫我们下车。我下车一看，四周军警密布，个个荷枪实弹，当即把我们50人为一汽车拉到敖包山上。第二天天一亮，日本就逼着我们去干活。到山一看，山下劳工住的席棚子一眼望不到头，在山上干活的劳工少说也有二三千人。山四周戒备森严，铁丝网密密层层，相隔不远就有一个岗哨。在山顶最高处有一个了望塔，昼夜都有两个日本兵向四周了望。日本鬼子还对劳工严加监视，不许劳工们互相交谈。我们私下互相询问，方知来的劳工不是被骗来的，就是被抓来的，家乡大都是辽宁南部、河北北部一带的。

日本侵略军逼着我们给他们修炮台、山洞等工事。我们干的是挑沙子、拌水泥、灌水泥等繁重劳动，住的是四面透风的席棚子。海拉尔二三月的天气十分寒冷，日本人也不给我们被褥，睡在硬木板上，每天吃的是两顿带不少壳子的高粱米粥，每天得从天亮干到天黑，夏天天长，一干就是十八九个小时。干活时稍微慢了点，监工的棍棒、枪托劈头盖脸地打来。我在郑家屯认识的一个老乡，干了一个多月就被折磨死了。还有一个劳工受不了这比牲畜还不如的待遇，逃跑中被抓回来，当天晚上，日本鬼子把我们劳工集合起来，当着我们的面活活地把他打死了。后来，有人悄悄地说，这个人已在这里干了3年了，家里还有母亲、妻子、儿女。我这才知道，这里的山洞至少已修了3年。

繁重的劳动，非人的待遇，很多身体很棒的小伙子很快就累垮了，生病了。但只要你还能动，就强迫你去干活，实在动不了的就送到病号棚。日本侵略者欺骗劳工说，送去隔离，以

免传染。实际上送进病号棚，就等于送进停尸棚。据我所知，当时没一个人能病好后回到工地去的。我在这年9月，因两眼烂了，看不见东西，被日本人送进病号棚，目睹了这里面的惨状：奄奄待毙的劳工们躺在那里没人管，连水也没有，天气冷了，身上还穿着破烂的和纱布差不多的更生布衣服。

我们那个棚子里躺着六七十个劳工，每天都有一些人死去，每天都有病号拉进来，隔几天就拉出一汽车尸体扔到坑里（我因为被逼着往坑里扔过两次尸体，所以记住了这个坑的位置，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万人坑）。后来，我的身体稍微硬实些，心想不能等死，在9月里的一个黑夜我趁看守的日本兵睡觉之机，逃出病号棚。当时，我逃到现在海拉尔市西山飞机场一带，遇到几个打草的中国人，他们同情我，给我饭吃，给我剃了头发（这时头发有半尺多长）。这样，我侥幸逃出虎口，虽然瞎了一只眼，但却成为日本侵略军在海拉尔蒙包山残害中国人民的唯一见证人。

蒙包山山洞前后修了10来年，到底有多少中国劳工被害死？迄今为止还不清楚。当时，我在山上认识的有三四百人，其中有不少老乡。解放后，我曾到处打听这些人的下落，但杳无音信。据说，日本鬼子为了怕放出劳工泄密，在山洞修完之后，将全部活着的劳工都害死了。

解放前，我一直不敢说自己是从蒙包山上跑出来的劳工。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使人民不忘旧社会的苦难，搞新旧对比教育，让我讲述这一段血泪史，我才领路找到这个万人坑。这里埋葬的白骨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的铁证。

（摘自《呼伦贝尔文史资料》第二辑）

孙吴平顶树血案

何尔华

笔者走访了平顶树血案的幸存者，孙吴县被服厂退休老人李志云，并查阅了有关史料。

日本关东军第四军第一百二十三师团进驻孙吴后，已先在曾家堡修建了一个军用飞机场，但以后不够用，于1937年初又在平顶树修建第二个军用飞机场。平顶树——靠近孙吴县城和日军司令部，距中苏边境仅50余公里，交通方便，附近丘陵起伏，灌木丛生，是日军理想的修建军用机场的地方。

日军为了加紧准备进攻苏联，从各地强征2 000多名劳工来修建平顶树机场。劳工们风餐露宿，无衣少食，在刺刀、棍棒的监督下被迫服苦役，过着非人的生活。日本侵略者却草菅人命，肆意残害劳工。

平顶树机场的2 000多名劳工，在日军的淫威之下，表面似乎平静地在忍辱负重的干活，但满腔的反抗怒火却如活火山一样随时可能爆发。劳工们大磨洋工，搞小要工，藉以发泄对统治者的愤恨。

过了不久，机场工地来了一位自称老王的劳工，找到把头说：“为了混个饭碗，要找点活干”。把头求之不得，满口答应，并编入平顶树山下的工棚里干活。这位老王30多岁，中上等个头，一副和善坚毅的面孔。他白天和别的劳工一样干活，并不时和一起干活的劳工唠嗑，晚上有时找个借口到邻近的工棚去串门。很快，老王就交了一些劳工朋友，劳工们也愿意和老王

在一起，有事也喜欢找老王商量，并私下里给老王取了个外号叫“三挂车”。由于劳工的伙食很差，终日只吃发霉的高粱米、盐水汤，吃不饱、病号多。老王就在劳工中鼓动向日本人提出要求改善伙食。他领着劳工找到把头，经过说理斗争，终于迫使把头答应让劳工吃饱。后来老王又打听到原来日本人是给劳工发点微薄的工资，但被各级把头层层克扣了。老王又领着劳工找到日本人和把头要求发工资，各不相让，双方争吵起来。老王乘机鼓动并领头打了日本人和把头。正在日本人要找闹事的带头人时，日本人却没发现他，老王跑到平顶树山上混到劳工中干活去了，接着，他又领着工人闹了几次小罢工。

1937年（伪康德4年）阴历八月，日本人接连两次无故杀掉没有给日本哨兵行礼的赶车老板和一个正在干活的劳工。劳工们在老王的带领下，利用这两名劳工的无故被杀害，带领全场2 000多名劳工，发动了一场大罢工以示反抗。

就在日本侵略者无故打死两名中国劳工后大约第五天早晨，晶莹的露珠含泪欲滴，微风吹着秋天的凉意使得劳工抱着膀子发抖，整个场地象死一般的沉寂。就在这时，日本人按惯例，拉响了上工的凄厉怪啸的警报。但是，老王所在的工棚几十名劳工都躺在工棚里不上工，这时只有少数几个工棚的劳工，拖拖拉拉没精打彩地向工地走去。日本人见状，又拉了好几次警报，最后一次足足拉了十来分钟。尽管日本人急如星火连拉几次上工警报，可全工地2 000多名劳工，大部分都不去上工。已经走向工地的劳工，一看这种情形，也坐在那里不干了。整个机场工地象条冻僵的蛇一样，躺在那里不动了。直到这时，日本人才警觉劳工们是在罢工了。于是调来大批军警，把机场包围起来，强令所有劳工集合，以枪毙活埋手段，威胁劳工说出谁是这次大罢工的带头人。从早晨八九点钟一直折腾到下午三

四点钟，才从2 000多名劳工中抓出6名所谓罢工的煽动犯。为了镇压吓唬劳工不再闹罢工，将其中的4名劳工，当场用刺刀杀死。日本人恨犹未消，兽性发作，又牵来两匹枣红色大洋马，将另两名劳工用绳子绑好拴在马鞍上，两名日本骑兵纵身上马，缰绳一拉，两腿一夹，大洋马长嘶一声，飞奔而跑，两名劳工在乱石满地的机场上，被拖得血肉模糊，活活拖死。到晚上，日本人将最先罢工的几十名劳工，调往其它工地，从此不见下落。

日本侵略者以为经过这次血腥残暴镇压，可以威慑住劳工不再反抗了。可是中国人民是杀不尽、吓不倒的。就在这场大罢工遭到血腥镇压后没过几天，五六百名劳工利用收工吃午饭休息的机会，带着行李集体逃跑了。当逃到腰岭河边时，将全部行李扔在河的右岸，过河向西北方向逃去。日军看到劳工大举集体逃跑，更是惊慌失措，急忙调兵遣将，前堵后追，一方面命令驻黑（河）、嫩（江）线上的日军沿线堵截，一方面派出日军步骑跟踪追捕，这时五六百名劳工已过腰岭河，四散逃命，各奔他乡。弄得日军疲于奔命，一直到黑嫩线上的二站和大岭之间，才截获了二三百人。其余的劳工，连同老王在内，都远走高飞了。

修建平顶树机场的日军被劳工的大举集体逃跑事件震惊了，法西斯的兽性发作了，对抓回来的二三百名劳工实行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就在当天晚上，二三百名劳工，在平顶树山下、逊别拉河畔，含恨死在日本的屠刀下了。日本侵略军急于修建的平顶树机场，也因劳工的集体逃跑被迫暂时停工。这就是当时震惊国境线的“平顶树血案”。

（摘自《孙吴文史资料》）

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 伪黑河省杀害中国劳工罪行

王登明

故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伪黑河省实行法西斯统治，残酷地杀害中国劳工，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现根据1954年黑河地区部分群众的控诉，整理如下：

原黑河城区七街居民叶福环口述

伪康德4年（1937年）我给日本鬼子（和田组）驾驶一台汽车，在西岗子村火车站往南山里拉砂子、水泥等，工人约有2000余名。是从天津、山东、沈阳、哈尔滨等地抓的，据工人讲，修完一个山洞，鬼子为了保守秘密，把这批工人半夜里全部用机枪打死，然后，再到各省各县重新抓劳工，修别的山洞。有一天夜里跑了两个工友，天亮被抓回来，鬼子把工人们集合起来，把两个工友扒去衣服，吊在架子上，用铁丝鞭子抽打，打得浑身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当昏过去之后，鬼子叼着烟卷得意洋洋，还叫工人鼓掌。

原黑河城区七街七组居民李子厚口述

伪康德4年春，我从长春被招到孙吴来当劳工，工人有3万人。那时我病倒在孙吴街里，当年7月；病好后来到西岗子做工。这时正赶上日本鬼子在西岗子南山修阵地，每天约来3000工人，听工人们说由哈尔滨抓来的。干完活根本不让工人们往

家捎信，用机枪全部打死。有一个姓乐的说，用机枪或木棒打死四五百人。

康德6年修山神府、双峡一带的汽车道，修完后工人往黑河来，有的穿洋灰袋子，有的披麻袋片，冻死饿死300来人。

康德10年修山神府飞机场，由关内招来一千六七百人，春季来的，七八两个月就死了半数，都是被打死或饿死的。工人们吃不饱，干活少了点，日本鬼子就打。还有的没死还有气，鬼子就往山沟里扔，在这飞机场死了足有八九百人。

刘俊芬口述

伪康德10年春，我在山神府作防疫工作，听劳工们说：由山神府至西岗子修了一条山洞，劳工是由山东省曹州府招来的，计200余名（山神府日军部队番号是八二）。修完山洞得以活命的40多人，这些人和日伪翻译不错，偷放跑的。其余的人完工那天，日本人说：“为了你们劳动中肯出力气，最后赏你们一顿大米饭吃吧！”结果吃了3个多小时，都毒死在里边了。

李桂书口述

伪康德8年，我偷看了一封军事机密电报，是日本人八二部队给副县长（日本人）的电报，电文大致是：现工事完峻，但因贵保安局（特务组织系统之一）分配的苦力，皆患传染性的疾病不可医治，请派负责人来检查，以便论涉。根据电文来看，是以患病为借口，对工人完工后施以屠杀。事实上那些年来已被日本人屠杀许多，尤其是特务系统送去的劳工，因为一般劳工不能用特务系统分配。

光复后，据璦琿县朝鲜屯刘大爷说：他到四不勒子去换过东西，发现在军事严禁区有很多的大坟墓，据刘说都是被抓去

的劳工修完工事，用毒药药死的。

解放时，日本退却前，驻奇克的日本特务机关，将押在狱里的“地下室”中的人连房舍一同烧了。证明书就烧了一麻袋多。

殷继川口述

伪康德9年10月间，由张耀东（把头）从北安招来200多名劳工，给日本鬼子修山神府大营，每天劳动13个小时。有的劳工跑了，被抓回来，冬天把人绑在电线杆子上用凉水浇……。不到一年半就剩下不足70人。仅我知道被日本鬼子杀害的有20多人，跑的、冻死的有100多人。

康德11年旧历二月我逃跑到磨浦和开库康。

原黑河电业局擦煤工李福口述

1936年我们一齐来东北做劳工的有60多人，半路逃走了10多人，剩40来人，每天干活从早上3点到晚9点（当时劳工中间流传一句三、六、九头传说），日本监工拿着镐把打，吃不饱，穿不暖，钱都让把头拿走了，40多人死了一半。当时在孙吴干活的劳工有2万人，在我们临走时，就冻死五六千人。

刘振章口述

我生在安徽省全椒县潘家村。1938年日本鬼子侵占我们家乡时，将300户的村庄烧杀6次。我被招劳工来到东北，一共来600人，在××沟挖金，日本鬼子杀害我们劳工70余人。后来修瑷珲县桦皮窑公路，劳工被折磨死了一大半，有病的就被抬出去烧了；600多人只逃走三五人。

王吉盛口述

伪岩崎部队在瑷珲县西岗子修军用设施，从伪康德4年（1937年）开始，至康德7年结束（1940年）。4年中约有100多次火车送来劳工，每次车约500人，就有五六万人。

伪康德5、6年时，我经过华家屯、华家老坟，见有许多大坑，里面都是尸首，死的也有上万人。

董福明口述

康德5年，日军把华集屯、宋集屯的百姓强迫搬家，房屋被拆毁。

张跃明口述

1932年，日本松木组从牡丹江招来不少工人，到瑷珲县西岗子山里做工，死了有800多人，逃走1 300多，出来700多。

1940年，山神府日本宪兵分队把工人弄去280多人，结果都没有出来。

周国彬口述

康德5、6年间，在长发屯的劳工死亡有200余人。

原黑河推销部杨凤沼口述

伪康德3年2月，天津日本租界大东公司用欺骗方法，在天津招劳工1100多人，在奉天（沈阳）招600多人，计1 700余人。这些劳工被骗到瑷珲县西岗子给日本岩崎部队修山洞，住的都是席棚子。有一个叫张贵芳的想逃跑，给抓回来当众枪毙了。我亲眼见到被日本鬼子打死的有：宋长科、张希云、张德兴、卢

青山，袁玉奎等人。我因受不了罪就偷着跑掉了，那1 700多人始终没见回来。

原孙吴县曾家堡陈玉岐口述

伪康德2年，我在大连被日本福昌公司招劳工，来到孙吴给日本修道和修大营，我们一共来了3 000多人。每天干19个小时的活，冬天住着席棚子，穿着洋灰袋子衣服，不给吃饱饭，就这样不到一年工夫，我亲眼见到就死了六七百人，以后我偷跑出来，那些人以后我也没见着。

原孙吴县腰屯张崇树口述

伪康德5年，我在天津被日本大东公司招到孙吴龙门山里做工，我们一共来了有700多人，由于冻死、饿死、被打死的，到后来只剩下40多人，我亲眼见到一个姓王的被活埋了，还有跑的被抓回来割去了耳朵等等，类似这样死的也不在少数。

原孙吴县腰屯周广连口述

伪康德9年，在山东朝城被日本昭和公务所招工到绥芬县纳金口子给日本鬼子修道的劳工由于冻饿、挨打，不到一年时间就死了1 000多人，只剩600来人，以后这些人不知死活。

赵玉章口述

伪康德5年，来额尼河修道300多名劳工，最后只剩30多人。这是我们亲眼见到的。

康德9年2 000多名劳工，只剩四五百人，死了1 000多人。

原孙吴镇十八组居民王锡庭口述

康德3年，由哈尔滨招到孙吴的劳工，到康德10年死了1 000多人。光成垛的就有4垛，每垛100多人。

康德11年3月有60多劳工在黑河挖排卧子，后来被送到桦皮窑修山洞，都被害死了。

康德11年4月煤窑沟有1 500多工人，死了200多人。

原孙吴被服生产合作社李志云口述

1937年1月，我们被孙吴的肖把头招来修平顶树飞机场的劳工有200多人，最后达到2 000人。因工人罢工，枪杀4名，用马拖死2名，扔到大河里了。有1名赶车的，因没给日本人行礼，被活活打死，扔到河里。在河边死尸就垛着300多。我也被日本子用刺刀刺伤，后好了。曾见到2个工人被抓去，跪在外边喂蚊子，后来也死了。有1个姓徐的腿被打断了。

原孙吴镇第三组席国梁口述

康德9年，修南北孙吴中间的大桥有劳3 000多人，叫日本鬼子治死千余人。我看见从席棚子中弄出七八名。

张纪忠口述

康德7年，招到孙吴53名劳工，挖孙吴南边的河。以后挖大壕，劳工170多人，冻死70多人，烧死30多。有1名17岁的常玉青逃跑被抓回来，活活打死。修孙吴北大桥的劳工被治死有700多，这是康德9—10年间的事。

侯宪义口述

康德7年，由关里招来3 000多工人，到孙吴北三架山修洞子，死了1 000多人。

郭兆杰口述

1939年招来300多名男女劳工，1940年饿死40多名，1941年死30多名，1942年到1945年光复死了120多名。

徐德顺口述

1939年旧历五月初四，×岛组从山东招来80多名劳工，死了60多名。

1940年我到“国际工人窝集”去干活，以后又到二六四五部队（即孙吴东仓库）干活，死了三四百名劳工。

康孙吴三区王文斌口述

康德2年，我被拉来东北虎林给日本子打石头，康德3年来到孙吴给日本六九四部队修大营、水道。

康德4年9月，由六九四部队装十辆汽车劳工，约五六百人，拉到山里集体屠杀了。

康德6年6、7月，孙吴有个叫老赵头的，给日本人放牛，他一天早晨到南山放牛，看见六九四部队，在头道卡子桥西面把100多劳工集体屠杀了。

听李景顺说：在1939年冬，孙吴南山阵地西南沟子里，日军杀害劳工500多名。

原孙吴西地营子藤吉发口述

康德4年，从北安抓到西岗子修南山洞子的劳工1300名，完工时，剩下700名，其余的都死了。以后我到别处干活，剩下700劳工，也被日寇集体屠杀了。

翟吉祥口述

康德3年，我被日本五九组（龟田）招工到孙吴小河西南山作木工。完工后，只有王锡发逃出来，其他62名劳工，被日本宪兵用机枪屠杀了。

日本X岛组负责修孙吴飞机场，杀害了60名劳工。

原逊克二区乾岔子村杨恒英：

康德6年，由哈尔滨被日寇104部队招工到孙吴的劳工有1500多人，饿死、冻死有700多。

赵俊唐口述

听在山里作工的王年久讲，死了2200名工人。

康德7年，在佳木斯抓来1700多工人，死200多人。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因饿的乱跑，叫鬼子把胳膊打断，过几天就死了。

吴良和口述

在西岗子给日本修山洞的劳工1500人，我亲眼见到死了100来人。洞子塌了砸死三四十人。总计死了有700多人。

（摘自《黑河文史资料》第二辑）

虎林伪满劳工初记

刘翰章

在日、伪统治者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北边振兴计划”和满洲经济统治反动政策下，虎林从1936年至1945年间，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同胞，在中苏边境、关东军驻地，修筑地上和地下军事设施、飞机场、军用道路、挖沟开渠、建筑兵营。当时，对中国同胞，通称为“劳工”。
这些劳工是从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强迫来虎林的。

(一) 被骗来的。这是虎林劳工的主要部分。每项工程都是先由伪虎林关东军整理部，与日本在东北经营的各包工大桓订立劳工合同。当时驻在虎林县的日本包工大桓有清水组、高岗组、大野组、大仓组、柳容组、盐泽组、荒川组、长谷川组、安藤容业、满洲生木株式会社等十来处，分驻在虎林、西岗、宝东、虎头。每处都有一二十办事人员。一个包工大桓的劳工最少几百人，最多几千人。各包工大桓下有若干中国把头，通常称为“二桓”。各包工大桓承揽包工，他们承包后，就派人到各处去招骗劳工。当时在虎林的大把头有高风坡、李国斗、马德良、谢水春、夏明久等。这些大把头，每处都派出若干亲信，到华北、辽宁、吉林一带，用花言巧语诓骗贫苦同胞。说什么到虎林去干活，一天能挣三四元国币，月月开工资，吃的好、穿的好，住的也不错，春天去了，秋天送回来。为了取得被招人的一时信任，还先给每人预发一二十元钱，作零花钱。很多同胞

上当，领到预支款，就身不由己了，被赶进戒备森严的大房子里，天官赐福的话，再也听不到了。招工的象个瘟神，手提大棒，严密看管，到了出发的日子，全被赶进瓦罐车（即密封的货车厢），车门有工头把着，日夜兼行，不到目的地不开门。吃、喝、拉、撒、睡，都在车厢里，刺鼻的气味令人作呕。被招骗来的劳工究竟有多少？无法精确统计，这里仅是根据一些知情人提供的材料，粗略地说：

1936年起，安藤窑业从外地招骗1 200余名劳工，先后在泰和、宝东、东风、西岗建了4处大型砖窑，胡德亮等就在宝东烧窑。

1938年12月，宋金昌、董占有等从长春市南岭被招骗来虎林高岗组当劳工，修小火车道，把头李国盛。

1938年春，关东军建兵营，西岗清水组、高岗组的劳工和宝东大仓组的劳工，就有3 000名。

1939年，张麻祥等100余名木瓦工，被招骗到虎林清水组建筑房屋。

1940年4月，王敏桂等从大连市被招骗到大野组，先在密山关东军仓库当搬运工，1942年3月又在虎林县宝东站关东军仓库做工。

1940年9月，侯作秀等从牡丹江被高岗组招骗至虎头修关东军兵营。

1942年3月，王庆增等400人，在宝东被把头夏玉义，招骗至虎林县高岗组，在西岗为关东军盖营房。

1942年4月，陈文林、栾贵堂等100人被大野组招骗到虎林，在迎门顶子修通往宝清、八千米、团山子三条军用道路。到迎门顶子后，发现当时在那修路的有1 000多名劳工，全是大野组招的。

1943年，杨传平被安藤窑业招骗至虎林县宝东车站烧砖。当时，安藤窑业在宝东烧砖的劳工有300多人。

(二)被日、伪政府强征来的。伪政府规定：在各县派劳工，名曰“勤劳奉仕队”，一期六个月。按时发往指定地点服苦役。逃避者，按国事犯论处。

1940年6月，辽宁省东沟县征派李玉成等500名农民，组成“勤劳奉仕队”，发配到虎林水克站(今半站)，由劳工大队长于文龙监管，给荒川组包工大桓，修通往虎头的军用道路。在他们来之前，已有500名劳工，在那挖山洞。

辽宁省黑山县，以“勤劳奉仕队”名义发配来的劳工，都在虎头修军用道路。

在光复的时候，东仓库有吉林省磐石县“勤劳奉仕”劳工500多名。

(三)在华北与日军作战中，被俘的我抗日将士和属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日本关东军把这部分人称为“特殊工人”，管理特别严，都是在武装监视下服苦役。

冈崎哲夫在《北满水久要塞》一书中记载：“修筑虎头地下要塞的应召劳工是从关内作战抓的中国军队俘虏，均称其为特殊工人。从1939年到1941年，华北有大量的中国军队俘虏，被送到虎头、亮达山方面修地下要塞，其数字是不知道，但止运来十辆有盖货车。”原虎头地下要塞工程部队作业队长石康勇在《工程进行过程，病死者不断发生》一文记载：“该工程由春到秋进行，使用从华北抓来的中国人和满洲国劳工约2 000人。”

1940年1月14日，我党领导的抗日部队，被日本军队在太行山区俘虏的常永年等约三四十人，在太原府押了1个多月后，用火车运到虎林县忠诚东南约四五十公里处修军用道路。

八路军三五八旅武廷山在去抗大分校学习的途中被俘，关

押3个月后，于1940年11月被送到虎林，与常永年一起修军用道路。

我一二〇师三八支队的连指导员武玉贵、连长范明忠以及胡玉贵、崔振山等人，被俘后，送到虎林县城内为关东军仓库做苦工。

1944年深秋，新四军被俘人员500多名，在我县忠信屯附近挖掘新开河（这条新开河从1939年开始挖，把大、小穆棱河连结起来，通乌苏里江）。

（四）以各种名义抓来的。大连市造船工人于丕喜、张为敬，1939年正在戏院子里看戏，就被抓了“浮浪”，送到我县永克站（半站）。下车后，用布蒙着眼带到工棚子。以后天天在火石山挖砂子，为修军事地下要塞备料。挖砂子的劳工，有好几百人。

王福荣是河北省玉田县人，因生活所迫到沈阳谋生。1943年，在街上走，就被抓了“浮浪”，发到密山日本关东军仓库当装卸工，不久，又发至虎林县城关东军东仓库当装卸工。

所谓“浮浪”，大部分是出身农民，由于失去土地，无力偿还高利贷，倾家荡产，辗转流离沦为游民；还有一些是因工厂或店铺倒闭而失业的工人或职员；再就是一些出入赌场、妓院输尽当光成为乞丐的流氓无产者。日伪统治时期，称这三类人为“浮浪”，见着就抓。还常常以抓“浮浪”为借口，把有居住证明的市民和有正当职业的工人，也给抓去，而且不容申辩。抓住便押送到矿山、边境一带去服劳役。

王锡先原是哈尔滨市皮鞋组合的制鞋工人。1942年2月的一天，正在独身宿舍睡觉，突然进来一些日本兵，将他抓到火车站。当时，还有修鞋工人40名、被服工人40名，都是突然抓来的，一起赶进车厢，发至密山关东军东仓库做鞋、做被服。同年4月又发至虎林关东军仓库。在虎林东仓库有500多名劳工。

二

在虎林，沦为劳工的中国同胞，数以万计。他们是20世纪的奴隶，在日寇的刺刀下服苦役，过着连囚徒还不如的生活。

一年到头住在席棚子里，长筒形的席棚子，两头留门，两边搭通铺，离地一尺来高，下边是一汪汪的水，中间有条过道，夏天阴暗潮湿，闷热得喘不上气来。冬天，冻得打哆嗦，睡觉得蒙着头。虱子满铺爬，跳蚤到处跑。

吃的就更糟了，开始还能吃上发霉的小米和玉米面，后来就吃橡子面了，苦涩难咽，喝的是馏锅水，就咸盐豆子，开饭时，把饭桶向工棚子门口一放，劳工们得到自己的那一份，有的蹲着吃，有的站着吃，不管饱不饱，就那些，不少人饿着肚子上工。

穿的，先是黑粗布，后是更生布。在每个劳工后背都缝上一块四寸方的白布，上面黑圈内印有“劳工”两字，同胞们厌恶地说：“我们天天背着王八干活！”冬季衣服，棉花又次又薄，都是破布制的更生棉花，根本不保温。一年只发一单一棉。为了不赤身露体，劳工们把水泥袋子抠三个窟窿套在身上挡风，腿上也用水泥袋子裹上。多数是披草袋子。一年只发一双胶皮水袜子，一双棉胶鞋。但很快就磨破了。劳工们看着自己的脚，嘲讽地说：“前面露蒜瓣，后面出鸭蛋”。不少人光着脚上工干活。行李更不用提了，就是被招骗时，自己带的那点，捆起来一掐来粗。

暴力下骇人的劳动强度。一般是每天早5点上工，上工时排成队，两边由把头手拿镐把监视着，不准交头接耳。出发时，在工棚前由把头点名，收工时，再点一次名。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在劳动中，发现谁干的慢，即认为是怠工，工头们抡起镐

把就打。有个把头一天打死七八个人，却满不在乎地说：“打死几个人算不了什么。”

大仓组，又名义和祥，早3点上工，晚9点收工，一天干18个小时，不是挑土篮，就是推轱辘马（小铁道上的推车），修石青山东的弹药库和炮兵阵地，被累死的、打死的就有80人。石青山埋葬了100多具劳工尸体。当时有“吃了义和祥的饭，就得拿命换”的说法。

新四军的被俘人员被发到忠信一带，掘新开河，每天上下工，都有十多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押着。到工地按人分段，必须完成。收工时，要把锹、镐的头卸下来，与把分别存放，防止暴动。每天都有被累死打死的。

被抓来的、强征来的劳工根本谈不上什么工资。被招骗来的，有时虽然见到一点儿钱，也是少得可怜，也无处可花。因为每天都被严密监视着，工棚外围栏几道铁蒺藜网，门口有人把守，出入不得自由。工钱绝大部分被把头诓去了。1941年农历四月，高岗组下的把头马厚民，以每天工资三四元为诱饵，从安东招骗了200名劳工，到10月1日，才给工人开了3次工钱，每人总共才得15元钱。其中有3名工人死于工地，4名工人得重病送回家后，不久也死了。陈文林等人从1942年4月被大野组招骗来修路，回去时，每人只发30元钱。孙同修1942年被大野组招骗来，修了一年路，只发了5元钱。高岗组大把头马德良，长期克扣劳工的工资，有一青年当众向他要，他恼羞成怒，抄起带钉的板子，当众把这个青年活活打死了。从此，谁也不敢提工资的事了。

由于劳动强度过高，饮食等条件太差，病倒的很多。劳工有了病，不但不给治，还逼着去上工，说什么：“只要你脑瓜子硬，就得给我去干活！”如果告病，不容分说，先吃一顿犒把，

许多病号被逼着上工去。劳工死了，就用苇席一卷，扔到荒山野沟。后来，因为死的太多，连苇席也舍不得用了，一扔了之。有些还没咽气，就抬出去，扔进了狼狗圈被活活咬死。

除被折磨死的以外，还有集体被日本军枪杀的。冈崎哲夫著的《北满永久要塞》一书，有两处记载了枪杀劳工事件：“1940年，虎头要塞工程完成后，将抓来的中国军队俘虏，摆酒宴引至山谷间，正在吃喝之际，山顶上的机关枪一齐向这些人射击，全部被杀死。”“1943年某日，虎头地下要塞工程十分之九挖通，将中国军队俘虏诱至猛虎山麓（猛虎谷）的洼地设酒宴进行‘慰劳’，其中一俘虏看势头不对，当即逃离，其余的见他离开，也都跟着向洼地逃跑。就在这时，埋伏在四周高处的重机枪响了，全部倒在血泊中。”

也有因被逼在恶劣条件下施工致死的：大野组修窑荣军用道路一段，是哈塘甸子，日本军逼劳工下水修，淹死了不少人。在虎林究竟有多少劳工死于非命，只能举出以下几例：据王庆增谈：“我们1941年来高尚组工棚子是400多人，到1944年向回送时，死去二分之一，剩200多人了。”

孙同修曾在虎头修地下要塞，据他谈：“1941年在虎头小南山工地共有3500来名劳工，到秋天向回送时，和北山工地的劳工加一起，才有2000多人。”

王攸桂的一位乡亲告诉他：“我1938年在虎头红线台盖兵营，挖水沟，看见一个山巒子里有一大堆死人骨头。”

1943年，在虎林街长友部队北边小山，有三四百名劳工，都是中国军队被俘人员，每天，身上围着水泥袋子，从桦树往北山运料，没见走的，只见桦树小南山，天天扔死人，群众把这地方叫“万人坑”。

虎头从西大沟至飞机场的军用公路旁，地下要塞周围的荒

野里、石青山根、迎门顶子山沟里、忠诚新开河两侧，每处都埋着大量的劳工尸体。

三

为防范劳工逃跑，工地住处戒备森严。工棚子周围置几道铁蒺藜网，大小公路均设日军岗哨。边境的住户，凡16岁以上，都发“居住证明书”，有不少人试图逃跑出去，又被抓回来，被活活打死了。

1939年8月，在西岗修弹药库的2名清水组劳工，冒着生命危险，逃到北山里，已经奄奄一息了。幸好被抗联第七军三师补充团战士发现得救。为了拯救苦难的同胞，在土顶子密营补充团团长李一平、五军政治部主任季青、五军三师九团长和政委等领导同志反复研究决定：从两个团挑选30名精悍的战士组成抢救小部队，由九团长和政委率领，于8月4日晚潜伏到西岗工地的庄稼地里。由李一平率两个连于子夜前到工地接应。8月5日零点40分，袭击了西岗工地，迅速消灭了敌守卫队，救出清水组劳工180多名。同时，打开仓库，让他们每人扛一袋面粉，撤离后，由于路上遭到日本守备队、警察的追击，在战斗中，失散60多人，其余110余名，随部队回到山里，参加了抗联。

这次抢救成功，震动了敌人，他们对劳工的看管更严了。但更重要的是鼓励了劳工，增长了求生图存的勇气。在西岗施工的清水组，1000多名劳工，有很多逃出虎口。1940年6月，在水克工地，李玉成用铁锹劈死劳工大队长、日本荒川组的头目及翻译，逃回了家乡——安东。

大约在1940年至1942年间，有2名修洞子的劳工，卸完砂子藏在汽车大厢板下，逃出工地。跳车后，跑到仁爱村。在他

们之后，又有七八个劳工逃到仁爱村。

1942年12月30日晚12点，常永年、伍廷山、郭来顺等5人（皆关内我军被俘人员）逃出后，经忠诚跑到乌苏里江边，越境去苏联，在伊曼边防站当上了侦察员。在他们之后，还有一些被俘人员逃出后，去了苏联。

对虎头的要塞工程，日寇是非常重视的，看管最严，防守也最严，但也没有防止住劳工逃跑。

1941年，1名劳工，拉荒跑到山里，吃野菜，喝沟水，辗转了一个多月，历经艰辛，终于逃回了沈阳。

1943年7月，一天午后，1名劳工从工地拉荒翻山逃到虎头火车站，碰到了唯一的中国人迎接手。这位迎接手，给他一锅刚烙好的葱梁面饼子，一大瓶水，把他藏到装原木的货车车厢里，使他安全逃到了哈尔滨。在虎头有很多劳工，借装木头货车逃了出去。

1944年，1名劳工听传说：修完洞子，劳工全给打“防疫针”害死。他想，在这等是死，不如豁出命来逃跑兴许有一条活路。他白天将绑草的柳条撒在地上作标记，夜间顺着标记逃出了工棚。到清河吃了一顿饭，奔兴隆、平原，到杨岗合民村落了脚。

连年来有不少人冒险逃出去了，但从整体上看还是少数的，大多数是不得不留下来，忍受苦役煎熬。但是，他们的反抗意识增强了。

被大野组招骗来的劳工，到1942年冬，大部分送走了，还留200来名不放。他们几次要求送回沈阳都被拒绝了，于是联合起来，在刘大个子和周小把头的带领下，闹到大野组包工大柜，砸了大柜的桌椅，并且把日本人金井痛打一顿。附近的日本兵荷枪实弹气势汹汹地赶到包工大柜，将劳工们围住，嚎叫着责

问：“谁叫你们砸的？”刘大个子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说：“是我领着砸的！”大把头高凤坡，刚才还吓得直打颤，这会儿在日本兵面前，他又施威风了，抄起大斧向刘大个子猛劈下去。刘的手脚灵活，连劈十几次，没有砍着。日本兵在那看了一会竟没管，不知为什么，撤回去了。不久日本大柜经理答应，年底一定向回送，大家听后，以为斗争胜利了。可是到了年底，日本人把刘大个子、周小把头叫到包工大柜，说是向回送，但他们一去就没回来，可能被害死了。留下这200来劳工，一直挣扎到1945年日本鬼子垮台，才结束了苦役。

光复后，广大劳工重见天日。8月9日、10日两天，有一千多中国劳工，通过虎林街。他们穿着破烂衣服，背着小孩行李卷，互相关照着，向西走去，一个个笑逐颜开，解放回家的喜悦一时代替了多年的凄惨。

（摘自《虎林文史资料》）

白骨累累五顶山

刘学让整理

五顶山原名卧尔古力山（赫哲语：孤山之意），位于黑龙江省富锦县城东南20公里处，当地人习惯叫它东山。它是小兴安岭余脉渡江（松花江）南下而成。东西长，南北短，其走向是西北——东南。最高峰为538.7公尺，总面积为120万平方公里。山北临滚滚的松花江，东南山脚下的公路是同江、抚远、饶河等县通往富锦、佳木斯的咽喉要道。敌伪统治时，这里是加强“北边震护”、封锁松花江面、控制富锦重镇、防御苏军进攻

的重要军事基地。因此，这座世世代代不为人知的荒山野岭被当时驻扎富锦的日本关东军一眼看中，从1942年春天始，在五顶山修筑秘密军事工程、挖掘山洞、设置碉暗堡……。

神秘的“勘测队”

1942年，犁杖刚下地，五顶山下突然开来数十辆日本军用十轮大卡车，车上的日本人一律穿着土黄色的“勘测队”工作服，奇怪的是这伙“勘测队”不戴头盔和保甲长臂章，而是自带翻译（日本人），在山脚下召开了村长会议，都用流利的中国话讲：“日本关东军要派‘扶桑社’勘测队到五顶山进行数年之久的测量，皇军命令，三日内搬出，拆除山里所有的窝棚、马架子，三日后果人畜均不得入山，违者开枪打死勿论。”从此，附近村寨无一人一马再敢进山了，大约十数天后，蒙着军用苫布的日本军用卡车便越来越多的在山里进进出出。同年秋天，日本人又从富锦县城西原“江上军”司令部的口牌到五顶山修建了一条杨柳小铁道，小铁道一竣工，日本关东军便下达了命令：晚6点到第二天早6点沿小铁道两侧的村屯一律戒严，住户熄灯，车马一律入围，违者开枪打死勿论。从1942年起，小铁道上每天夜里车不断，大批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五顶山。就在这条小铁道彻夜不停地向山里运送物资的同时，夜间，富锦县城至五顶山的公路上也出现了大批蒙着苫布的日本军用卡车，满载着从关里、辽宁、吉林等地抓来的劳工。从此，东山出煤出铁的谎言被人们看穿，人们再也不相信“勘测”的鬼话了。

三个穿水泥袋的“纸人”

1942年秋天，西五顶村西北岗上种了一片高粱，长势十分喜人。一天早晨，有位50岁左右的老人到地里看高粱成色。他

正走着，突然，不远处响起了高粱杆的哗哗声。老人以为是有人偷庄稼，便紧走几步大喊一声：“站住！”随着喊声，他猛然发现几步外跪着3个人。说是人也只有三分象人罢了。这是3个穿水泥袋的“纸人”，满面污垢，头发胡子连成片，除两只眼睛外，全身几乎都是黑色，一个个骨瘦如柴。这3个人跪着一动也不敢动，浑身颤抖，瞪着红肿的眼睛望着老人，任老人怎么询问也无人回答。经老人再三解释后，一个操唐山口音的人（已无法辨别年龄）才战战兢兢地问：这是什么地方？是中国还是外国？当他们知道这里是“满洲国”也就是东北三省的地方时，一个个才如梦初醒，面部露出一点喜色。当老人询问他们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从山里逃出来的劳工时。3个人则面面相觑，吓得一言不发。接着就叩头不止，要求给换件衣服，给点吃的，再给指条生路。说要每个人从怀里大把大把地掏大烟土，做更衣求食的酬金。当他们知道这位老人是地主家的长工时，才承认了是从五顶山逃出来的劳工。老长工再三叮嘱他们：白天行走不便，就躲在这片高粱地里，饿了就啃大半浆的高粱穗，天黑时我再送你们上路逃生。

天黑以后，那位老长工才领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悄悄地出了村。老长工夹的破囊衣里包着几件破旧衣服；小男孩拎个破“嘎大罗”（小铁桶），在碎草乍边藏着几块两合面的饼子和几块咸菜疙瘩。这一老一少进高粱地后，悄悄地寻找“纸人”。怪了，那三个人都不见了，但他们也不敢大声喊叫，两个人只好挨个垅沟里寻找。足有半袋烟工夫，这三个“纸人”才从三个不同方向悄悄地出现在一老一少面前。原来这三个人对老长工不大放心，唯恐他回去报告什么人。他们躲在暗处，发现确实没有尾随老长工的人后才慢慢走出来。当他们看见两合面饼子、咸菜时，真比见到御宴还馋，但老长工只准许每人吃半个

饼子、一块咸菜，怕他们吃多了胃肠受不了，剩下的叫他们留着路上吃。在他们三个人狼吞虎咽地吞食饼子时，老长工从兜里掏出一把打马鬃的剪子，为他们“理”了发。这时虽说天已黑了，但上路还早，老长工让他们再等一会儿，叫小男孩到地头去“放风”。这时操唐山口音的那位才较详细地叙述了日本法西斯在五顶山秘密修筑军事工程，残暴屠杀劳工的悲惨情况。

五顶山之谜

1942年春天，日本关东军占据了五顶山之后，从日本国内派遣专家，运来大批军用物资，抓来数万中国劳工，修筑五顶山军事工程。工程的总指挥是一个日本少将（姓名不详）。看押劳工的全部是日军，驻山下的靖安军不准进山一步，就是伪军官也不许踏入禁区。

五顶山的工程大致分三部分：一是修盘山道；第二是修山洞；第三项工程是修各种明暗碉堡。

五顶山上的劳工

五顶山的劳工2万余人，全是外地人。大部分是来自热河、锦州、河北、唐山等地，多是当时抓的“浮浪”，其中也有华北、山东地方抗日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和所谓“政嫌”人员。抓来的劳工一旦被决定送往富锦五顶山，便被集中到指定的地点，给每个人戴一顶“黑帽子”，将头部套严，无论乘火车还是轮船，不到地方不准摘掉。

日本关东军对全山劳工的管理是区、棚、队、班管辖。全山分若干区，山内由日本关东军统辖，山外由伪靖安军骑兵团设防。山内分东西南北四个区，每区下设若干棚（劳工住处），每棚住100到120人，每棚两个队，每队4个班，每班10到15

人（缺额不增补）。穿水泥口袋的3个“纸人”就是西四区205棚的劳工。

每棚劳工有一个日军小队看押（10到12人），并配备3到5只日本狼狗。日军看押劳工的小队分两班，每7天一换班。狼狗白天由日本兵牵着，夜间全部放开。若想出逃，不用说那些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就是这些大狼狗也无法对付。另外每区设一中心大狗圈（有三十多条大狼狗）和一个医务所（实际是屠杀劳工的机构）。

劳工们开始进山时，还能吃上几顿玉米面饼子，后来就是黄豆粕子掺橡子面的混合稀粥。一年四季喝的是山水、雨水和雪水。最困难是穿的，劳工人棚分班编号后，每人只发一套作业服（灰更生布），上衣的前后心有劳工本身的号码。就是这样的衣服穿坏了也不再发，为此，不少劳工大都穿水泥口袋制的“纸衣”来遮体、御寒。这种奇异的“服装”，不论盛夏酷暑还是三九严寒，一年四季不离身。

每天早上出工前，各班劳工集合在大棚前“点呼”（点出勤人数及个人号码），然后，戴上“黑帽子”，在日本兵的监押下出发，劳工每人左手扯一条长绳子，右手持工具。每班一条绳子，时间长了，日本人也就把每班称为“条”或“串”。到现场时摘下黑帽子，按监工员的命令干活。中午不准出坑，发给每人两个黑饼子、一块咸菜。为此，劳工都不知道具体作业地点，更无法知道去现场的往返路线。收工后仍然“点呼”然后接“条”戴黑帽子回棚宿营。对劳工监视、看管最严是夜间，睡前“点呼”一次，一律头朝里睡，把每人的左肢用一条大绳拴住，五个人拴在一起叫“一串儿”。夜间不许大、小便，有特殊情况时，则一串人起来，同去同归。

日本侵略者是绝不会让中国劳工活着出五顶山的。在山内
• 516 •

的劳工大致分两部分：一种是可以转移工地的，如修盘山道、盖席棚、修筑蓄水池、化雪池、伙房以及干零活的勤杂、开山打石头、打砂子的劳工均可以干完一项工程，转移到另一区去。但另一种挖山洞、挖秘密军用仓库、修碉堡、地道以及攻防重要军事绝密工程的劳工，工程结束之日便是全部劳工“归天”之时。但无论哪种劳工都别想活着出五顶山，只是稍有时间上的先后罢了。

日本侵略者屠杀劳工方法之多、手段之残酷，真可谓古今罕见。

劳工的“医疗所”和“狗圈”：劳工们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低劣的狗食不如的伙食，一年四季穿“纸衣”，住席棚，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怎能不得病？但是劳工最怕生病，有了病也挺着出工，劳工们也帮助瞒哄着，一旦被发觉（多半已是卧床不起者），日本兵便拉着去送“医疗所”，多半是有去无回。劳工们把医疗所和狼狗圈看成一码事，生病的劳工被加上传染病之名后便是狗圈的“上宾”。日本人为防止活人被狼狗吞噬时发出惨叫声，事先给病人打一麻醉针，而后便投入大狗圈。日本人对山里所有的狼狗很少喂其它食物，大都以中国劳工骨瘦如柴的身躯为食，个个吃得膘满肉肥，皮毛发亮，整日瞪着一双血红的大眼。

贻害劳工的大烟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劳工如果说有点“优待”，那就是从入棚编号起，每人每日发一个烟份，半年后发两个，超过一年的，每日发三个大烟份（约一钱半）。因此，劳工们全染上了鸦片烟瘾，就是离开五顶山劳工区，也无法生存。说是“优待”、“治病”，实际是慢性杀人。一项绝密工程竣工，不用一枪一弹，只要三日停发大烟，全棚劳工便就地长眠。这大量的烟土，是日本开拓团专为五顶山军事工程种植加工的。

屠刀下的劳工：同一区的劳工，棚与棚是严禁接触的。每棚四周全是电网，日军岗哨居高临下地日夜监视。日本人对劳工的要求异常严格，无论现场干活、往返路上、或在住地食宿，发现劳工稍有违纪、反抗、逃跑的迹象，便当着众劳工的面用战刀砍头示众。在干活时对“磨洋工”的、不慎损坏工具的，轻者一顿毒打，重者也照样砍头。有时也不知因为什么，日本人酒后就随便把哪个人拉出砍头。

惨死于毒药：一项工程结束，日本人也要开个“庆祝会”，会后要给劳工一顿平日吃不到的好饭食：两合面的馒头，一大碗带油腥的菜汤、两块日本咸菜。劳工们常年不见米面，当然个个狼吞虎咽。可谁知，日本人在饭菜里下了毒药。时间不长，全棚劳工便一排排、一条条地头朝里，规规矩矩地死去了。第二天，日本人便讲：“某区、某棚劳工得了传染病全部死亡。”为防止“传染”，倒上汽油，一火焚掉。

送劳工“回家”：对入山较久的劳工们（幸存者），当某项工程结束时，日本人便大讲特讲：“劳工们辛苦大大的，送劳工回家种地，多多‘出荷’。”让劳工们到指定地点集中，点名上车。劳工们要照样戴上黑帽子，坐在蒙得严严实实的卡车里满山转游，最后送到“万人坑”一车一车地杀掉。

对临时从山下村屯抓去的车夫、干杂活的人也从不放过，先用铁条捆绑双手，逐个地砍头杀死。住富锦县大榆树乡宝林村的马运荣（外号马铁脖子），便是1945年8月9日被日军抓进山的车夫，被日军在撤退前用战刀砍倒在南山区。这次共砍了13人，因马的主动脉没被砍着，夜半苏醒后爬出五顶山才死里逃生的。

日本侵略者就是这样灭绝人性地用极狠毒、残忍的手段屠杀无辜的中国劳工。从1942年到1945年8月，在这座山上共杀

害中国劳工2万余人。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黑龙江省富锦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马 铁 脖 子

孙恒久整理

1910年，马运荣出生在黑龙江省富锦县大榆树乡宝林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当时依靠父亲给地主打长工勉强维持生活。他从小就给地主放牛、放马，当半拉子，受尽了地主的打骂。1945年，35岁的马运荣才结婚成了家。为了生活他离家到县城给赵豆腐坊赶车、喂马，种地当长工，维持全家生活，这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圣战”处于日暮穷途、节节败退的困境。日军为了挽救败局，急于抢修富锦东卧尔古力山的军事工程。卧尔古力山位于富锦县城东南20华里，是个重要军事阵地。1932年日军入侵富锦以来，在东北三省和关里等地抓来成千上万的劳工，在山上修筑明碉暗堡、军火库等军事工程。这些劳工先后都被日军杀害在山上。1945年8月初，日军为加快未完工程进度，便疯狂地到农村抓劳工、要官车。一天，日军闯进了距东山二十多里福德屯，屯里的劳力、老板知道一去劳工是凶多吉少，都跑光了。马运荣是给赵豆腐坊在这屯种地、喂马的长工，因他晚上喂马，白天正睡觉，不知日军进村而被抓住。从此，他们整天在日军的屠刀监视下日夜抢修工事和运送日军准备撤退隐藏军需物资。这时，苏日两军已经接火，苏军飞机不时在卧尔古力山上空盘旋轰炸和扫射。日军垮台的日子就要到

了，劳工们盼望着早一天回村和家人团聚，可杀人成性的日本法西斯怕泄漏军事机密和掩藏的物资，竟对13个赶车“老板”下了毒手。一天下午，突然闯进工棚子一队手端刺刀的日本兵，逼着他们集合到工棚子屋内的西南角，然后把他们双手倒背过来用铁丝拧上，穿成两串，用刺刀逼着他们出工棚，东西一字型排开，站在山坡上。一个日本兵手提战刀从西往东砍，正在砍的时候，苏军飞机飞到上空盘旋轰炸，日本兵在慌乱中钻进山洞躲起来了。当时有一个穿在另一串上的小伙子，破开铁丝的捆绑，突然窜出往山南坡跑去，日本兵开了一枪，打伤了那人胳膊，但那个小伙子终于逃出了虎口。后来知道那个人是太平川仁安屯的。飞机过后日本兵出了山洞，把剩下的老板一个一个地杀了。砍到马运荣时，他看到一刀影向他头上砍下来，在他一缩头的工夫，刀已砍在脖子上；他就昏倒在死人堆里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苏醒过来了。原来日本兵的屠刀砍到他头上的一霎那，他见到刀影下来就一缩头，头上的毡帽给撞了一下，只砍断了他的“大脖筋”，颈动脉却没伤着。他苏醒过来以后也没敢动弹，等候着日本兵的撤离。他在死人堆里躺了3个多小时，蚊子、瞎蠓咬得实在厉害，他在不知不觉中动了一下，被守护在尸体旁的日本哨兵发现了，那日本兵一边喊叫着，一边用刺刀在他肋部刺了两刀，他又昏了过去。在半夜时他又苏醒过来，看到满天星斗，还听见了日军哨兵巡逻来回走动，咔、咔、咔的脚步声。他知道自己还活着。就是抬不起头来。生存的欲望促使他想，只要有口气就得想办法逃出去。他开始一点点的交错挣脱着拧在双手上的铁丝，不知用了多少时间，费了多大的劲，终于把铁丝拧断。他用一只手托着脑袋，用一只胳膊着地匍匐着从死人堆里往南坡的山下爬去。爬出一段路，因为夜深人静，他爬行时哗啦的响声，被日军哨兵听见了，随着

哨兵的喊叫声，向他爬动方向开了枪。他静静地趴在草棵里一动不动，听到哨兵走远了，他又继续往山外爬，爬进草丛，爬过树林。爬着、爬着，遇到了日军设置的铁丝网。他就一只手托下巴，一只手拄地从低处贴着地爬了过去。后来，又遇到了一个3米多深、3米多宽的深沟，他用双手抱着脑袋滚进大沟，他又昏迷在沟里。再苏醒过来后，他歇了一会儿，用尽全身力气用手拽着大蒿子一点一点地爬出了深沟。他一边爬一边不时地回头看看，怕日军追来。这时他发现身后不远地方，有两只闪烁着绿光的眼睛；他知道这是在附近吃惯了牲口尸体的野狼，闻到他身上的血腥味跑上来的。狼看他还能爬动，没敢扑上去吃他，但始终跟在他后边。他想：就不扑上来咬我吗？我就得争取时间往山下爬，到山边遇到人就有救了。就这样他提心吊胆地用大半宿时间，从丛家大沟爬出了山。到天蒙蒙亮时，他爬到离山十多里路的新发屯。他因流血过多已精疲力尽，到刘三虎子家大门口处又昏迷过去了。当刘三虎子家早起开门时，发现一个血人躺在大门口，刘家把他抬到屋里。他慢慢醒过来后觉着口渴厉害，就喝了一瓢凉水。刘三虎听到他用沙哑的声音讲述了他的遭遇后，立即到街里给赵豆腐坊送信，赵家用车把他拉到街里治疗，治一段时间后，两肋处刺得透腔的刀伤见好，脑后砍断的“大脖筋”又因刀口太深治也不见好，包扎化脓生蛆了。看他的亲友说：“这回够老马识的，事情怕不好办。”

这时，苏联红军已在我抗日军民配合下出兵东北，并已进驻富锦。有的亲友给他出主意，动员托托翻译，邀请苏联红军司令部医院为他治疗。经过工作，苏军司令部知道是被日軍砍头没死的劳工，欣然同意为他治疗，这样马运荣就住进了苏军设在富锦的医院（地址在富锦镇原天主堂院内）。在红军医院里他得到了抢救治疗，在苏军医护人员亲切关怀、精心护理下，经

过20多天治疗，他很快就痊愈出院了，但因刺刀刺进了胸腔，虽然治愈了伤口，由于气胸，他说话费力，声音嘶哑了，颈部留下一扇指大的一个疤痕。体力也很衰弱。

在日军屠刀下的幸存者马运荣，出院后高兴万分，不知用什么语言能表达出自己的激动和感激的心情，于是他逢人就讲：“日本鬼子砍了我的脑袋，是苏联红军又给我安上了个脑袋，不然哪有我马运荣的今天啊！”从那以后村里人都说他是“铁脖子”，“马铁脖子”的外号就这样传遍全县。

马运荣身经旧社会的磨难，又惨遭日军的屠刀，身体过早衰老。50多岁就丧失了劳动能力，长年弯腰驼背，说话很费力，后因肺气肿，于1972年在宝林村去世，终年62岁。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九辑，黑龙江省富锦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东宁县庙沟惨案

宋亮章

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南部的东宁县，是一个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边陲县城。它东邻苏联，南近朝鲜，北靠国境口岸绥芬河市。边境线长175公里。

由于东宁地理位置的重要，自古以来就成为我省东南部的边陲要塞。

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侵略者逐步向北蚕食，占领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后，进而又集中兵力向牡丹江以东地区逼进，1933年1月东宁县也被日军占领。

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宁县后，采取软硬兼施的残酷手段：一杀、二拉，即是以捕杀抗日联军为名，大肆屠杀爱国军民和无辜群众，仅是三岔口县城，一次就杀害200余人。与此同时，还收买了以项团（原救国军）和当地的土豪、劣绅为骨干的汉奸队伍，协助敌人镇压抗日军民。

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其长期侵占中国领土和反苏的需要，在东宁县驻扎了数万名日本关东军和伪治安军（开始叫“红袖头”或靖安军），他们强迫被俘的抗日战士、被抓来的劳工和挑选的“勤劳奉仕队”到处抢修公路、建造兵营、飞机场、战勤医院、仓库、碉堡、挖坑道、设工区，一时间公路成网，兵营成片，碉堡林立。

特别是从1937年以后，日本侵略者在突击上述工程的同时，又增加了地下工程（在山峦险处利用有利地形修建能守善攻的永久性防护工事），在数以百计的“地下工程”中，绥芬河左岸，紧接苏联边境线上的庙沟“地下工程”要算最大的工程了。这里山高林密、地形险要，庙沟岭象一面屏障环东宁县北部。把东宁县划为日本关东军前线防卫司令官本部，派一名中将驻马家大营（今万魔沟），统辖东宁县的所有部队。在国境线上配备重兵把守，仅少将军衔的指挥官就有3人。以庙沟岭为例，在庙沟驻扎的七七七部队，是一个步兵联队，负责重要山头的哨所、关卡和阵地防卫工作；在庙沟里边则建有七七〇三骑兵和炮兵混合旅团。

日本侵略者为了把庙沟这个重要前沿阵地建造或坚固耐久的反苏基地，他们绞尽脑汁，费尽心机，除了用当地硬性招雇来的一批铁、木、石匠外，还用大批民工给他们修造兵营。并把从关内抓来的抗日战士和诱骗招雇来的穷苦工农群众，大约3 000余人，组成了10余个工区，开山凿石，掘土挖洞，每天都

要干 12 小时以上的苦活。为了安定当地群众，收买人心，在刚开始修造兵营时，对民工还能照顾些，活计还能干得来，可是没过多久，活计越来越重，伙食越来越差，到后来连工钱也不给了。不少民工忍受不了这种欺压，凭着熟悉地理环境的有利条件，趁着黑夜逃走了。

日本侵略者为了防止劳工逃跑，除了到处搜捕之外，还采取了更加狠毒的管理办法：在原有固定岗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巡逻队，并在工区的四周架起了铁丝网和电网；对劳工（包括民工）实行了集体出工和“连环保”制度（即是互相监督，互相担保）。随着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各地的势力范围的扩大和日伪政权的日益巩固，对被俘的抗日战士和劳工的血腥统治更加残酷，使他们不仅吃不饱、穿不暖，而且还经常给以肉刑，冻死、饿死、病死的很多。稍有反抗就活活打死，有的还被扔进狗圈里咬死。在山沟里到处可见成堆的尸骨。

据逃出来的当地民工张喜福讲：他在伪满康德 4 年（1937 年）春天，被日本侵略者硬性招工到庙沟里打石头和修“地下工程”，一干 4 年多。在伪满康德 8 年（1941 年）夏天的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里，他和另一名伙伴，假借腹泻外出之机，乘敌人巡逻未到跟前之际，从铁丝网与电网下面的被山水冲出的小沟里慢慢爬了出来，然后趁着黑夜，冒雨逃回了北河沿村，藏在亲友家里躲过搜捕之后，才活了下来。

1945 年 8 月中旬日本投降了，东北解放了。一天下午，有 30 多个身穿破衣、瘦骨嶙峋的人来到东宁县地方治安维持会（解放当时临时成立的维持地方治安的组织）门前。他们悲愤地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在庙沟犯下的罪行。原来他们都是从山东、河北一带被抓来的劳工和个别的被俘抗日战士。已经被抓来三四年之久。他们说，仅是几年的时间就先后抓来了 3 000 多人，可

是到后来活着出来的只剩下他们这30多个人了。他们之所以能活着出来，也是经历了一番痛苦的博斗才脱险的。

1945年8月8日的夜晚，苏联的探照灯突然由国境线射向了日伪统治森严的东宁县城，同时出动了数十架飞机在国境线上空盘旋，在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苏军向日本关东军的前沿阵地发起了攻击，双方展开了激战。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对劳工大队也开始了血腥的屠杀。为了无声地消灭人证，他们假惺惺地说：为了保证劳工的人身安全，防止被炮弹炸伤，所有劳工都要按工区迅速进入“地下工程”的巷道里去，并要在入口处堆集3—5米厚的砂石、泥土，以防毒气进入。就这样，在武装看押下，几千名劳工被迫进入了“地下工程”，然后又一段一段地用砂石、泥土隔绝开来，从此他们就永远地被埋葬在里边了。由“地下工程”里逃出来的这30名劳工，因为他们是最后进入“地下工程”的一部分人，靠入口处最近，又加上他们齐心合力地扒开了堆集在巷道里的砂石、泥土，才侥幸逃了出来。

据逃出来的人讲，实际看到的部分“地下工程”是一处工程浩大的设备比较先进的永久性防卫工事。工程的设计是按照山脉走向，分上、中、下三层建造的，长约30余公里。入口有多处，正门入口是设有转盘式大口径炮。在主要巷道口的转弯处，并设有高达数十米、粗三米左右的通风孔（又称天窗）。在巷道里铺设着运载麻袋和物品的钢轨，每隔数十米便在两侧设有射击口或库房、宿舍、抢救室等。“地下工程”分“弓”字形和阶梯形等构造，整个工程都是用钢筋、水泥建造的，十分坚固。

日本侵略者苦心经营的庙沟“地下工程”，在1945年8月随着日伪的彻底垮台而告终。在解放初期，当地居民有些群众都

曾进入过被破坏的部分巷道里拣东西或砸铁筋，看到了很多被迫害而死的劳工尸骨和遗物。

（摘自《牡丹江文史资料》第三辑）

万人坑

血肉模糊万人坑 屠杀史实数不清

方 覺 姚云鵬

从1905年算起，到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日本国昭和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抚顺煤田被日本帝国主义强行霸占长达40年之久。在这40年的漫长岁月中，日伪抚顺军警宪特机关，其中包括满铁抚顺炭矿劳务课和“劳务兴国会”，对煤城人民残酷统治，血腥镇压，先后不知有多少爱国抗日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惨死在日本法西斯的皮鞭和屠刀之下，又有多少采煤矿工被日本工头摧残致死。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只顾疯狂掠夺，狂开乱采，不顾生产安全，置矿工的生死于不顾，又有多少矿工惨死在地层深处的矿井之中。

仅据胜利矿一位年逾八旬的退休工人刘永财回忆说：“日本侵略者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不管工人死活，人死了往‘万人坑’一扔了事。”而用日本法西斯分子惯用的话说：“支那人的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没关系！”煤城劳动人民被日本帝国